

Fu Dan University 1905-2005

朱维铮等著

马相伯



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传略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相伯传略/朱维铮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
ISBN 7-309-04498-3

I. 马… II. 朱… III. 马相伯(1840~1939)-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6869号

马相伯传略
朱维铮 等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0.25 插页 2
字	数	272 千
版	次	200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7-309-04498-3/K·155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840-1939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专题研究、资料辑录、亲历回忆三个不同角度，比较全面而又详尽地勾勒出复旦大学创始者马相伯先生的生平要略。

朱维铮所撰《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一文，是关于传主马相伯先生一生政治生涯的考论力作；陆永玲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和李天纲的《信仰与传统》，则分别对传主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传主的宗教生涯，作了全面的探索和论述；张荣华的《“函夏考文苑”考略》及所附有关资料，又就传主当年筹组中国近代学术科研机——“函夏考文苑”一事始末，作了鲜有人为的考索钩辑；而廖梅的《马相伯生平简表》，则是在细梳大量原始资料后的精心考订之作，从而更加微观地反映传主一生的轨迹。此外，书中辑录的传主当年期颐大寿之际有关方面的庆贺电文和辞世以后的吊唁祭悼诸作及传主亲友门生的追思回忆，以及由王建平收集提供的有关照片等，无不为珍贵难得的文献资料。

全书所收各篇，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述，还是相关文献的辑录排比，均体现出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特色，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弁 言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还是十九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新事物。而由接受这一新事物的民间名宿,超越当时清朝官办京师大学堂照搬的日本新式大学模式,直接从导致西欧走出中世纪的教育体制汲取灵感,自主创办的中国新式大学,更是二十世纪初叶才有雏形出现。

这一类的大学雏形,在百年前的中国,本来就堪称凤毛麟角,而饱经人间沧桑,不断蜕变成为世人瞩目的百年名校,如今尤其屈指可数。一九〇五年九月始创的复旦大学,就是其中一所。

不是每所百年名校,都有值得历史称道的创校校长。复旦很幸运,因为上世纪初为她催生的首任校长马相伯,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曲折进程中,留下过多重坚实的历史足迹。所以,尽管他当初主持复旦校务,累计不过四年,尽管他已于一九三九年以百岁高龄去世,却至今没有被中国人忘却,更没有被复旦人忘却。

“名者实之宾也”,百年来的复旦校史,正如海内所有百年名校的校史一样,证明自己非复“吴下阿蒙”,都已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剧变,包括不断兼并其他新老大学,演化成如今的复旦大学。

然而,“饮其水者怀其源”。正如人们共饮长江水,明知它由众流所汇却又乐于追溯江源,多年来陆续加盟复旦的新老复旦人,在同庆复旦建校百年之际,自然也都对共同母校的创办人马相伯的传奇一生,发生了解兴趣。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马相伯传略》,便从历史的不同侧面,分别陈述马相伯一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



人文学科改革,付出的努力和历史效应。

本书由两类文字结集而成。

一类是马相伯的传记研究。凡收四篇论文和一篇生平简表。

论文前三篇和生平简表,均出自我主编的《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四篇录自《复旦学报》。五篇文字的作者,都曾参加一九八九年起由我和加拿大、美国两位学者共同主持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马相伯研究”。原计划由我主持写一部马相伯传。但历经曲折,有关马相伯的原始文献和海内外研究材料,基本搜辑完备,已在时移事异的三年之后。犹豫再三,我提出与其众手修史,费时费力而勉强写成《马相伯传》,不如各展所长,分别从不同角度通述马相伯在特定领域的一生作为,唯允我承乏文字笔削。拙议得到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和稍后担任年表编制的廖梅诸友赞同。因而除张荣华的论文未及收入《马相伯集》的“后论”,现在集入本书的四篇论文和一篇年表,其实是当年关于马相伯传记的统一表述的分别反映。

二千纪前苟况便鼓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尽管就史论史,我不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信徒倡导的直线进化论,却依然不敢苟同什么先知先觉说,尤其憎恶用权力大小判断识见高低的古今胡说。本书收入的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的三篇论文,以及廖梅用至简语言概括编成的《马相伯生平简表》,当年便令我自叹弗如,如今倘要我就同一课题撰文制表,也未必蓝胜于青。

因而,时过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校庆百年而推出历任校长传记,唯于首任校长马相伯的传记,仍以为收入《马相伯集》后论的诸篇较宜,在我是同意的,但建议补入张荣华一篇。

本书第二类,可称马相伯百岁荣哀录。

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件”之后,年已耄耋的马相伯老人便发出抗日的怒吼。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和勇气,都胜过当年被排外式的民族主义迷惑的一般人士。因为他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即远祧秦始皇、李斯把



“天下无异意”视作“安宁之术”的传统，竟敢向蒋介石指出“纾国难”的前提，就是实行政治改革，因为“民治为举国一致之要求”，所以没有真正由宪政保障的民主人权，便不可能“自救救国”。正因如此，年逾九十的马相伯，仍被舆论称作“老青年”。

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马相伯照中国传统算法已满一百岁。由他的复旦首届学生于右任发起，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时隔近七个月，同年十一月四日，马相伯在客居的越南谅山逝世，引发举国上下同声哀悼。

在复旦，或者环顾海内的百年名校，有哪一位创业或继统的校长，有马相伯百岁那年享尽生荣死哀呢？似乎一个也没有。

因而，将十多年前我的年轻同事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分头跑遍全国搜辑的马相伯百岁哀荣的文献，合于本书刊出，似也别有意义。它表明中国传统所说的“盖棺论定”，仍然有可信性。马相伯一生坦荡，“此心光明”，生前既无不可告人的隐恶，死后留下的当然是追求至善的言行楷模。

用不着指出马相伯并非完人，但他可贵的品格正在于相信知行合一，行为决不背离信仰。由此引发他的心行矛盾，非教外旁观者所能赋予了解的同情。但他至死不渝，乃至被共同抗日而主张各异的国共诸党派同声称道，却不能仅仅用意识形态化的史观进行解释。

但愿本书集中发表的马相伯百龄荣哀文献，有助于读者认知那段历史。

朱维铮

二〇〇五年五月四日夜

目
录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朱维铮	1
引言		1
1. 局外旁观者		3
2. 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6
3. 失败的内外使命		11
4. 君主立宪派领导人		16
5. 为了宪法和民主		23
6. “民国”的沉思		32
7.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		39
8. 呼号抗日的“老青年”		46
9. 国民政府委员		50
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陆永玲	57
1. 三所大学的创始人		57
2. 一位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60
3. 从震旦到复旦：1903—1905		65
4. 新的希望：筹建函夏考文苑		79
5. 无止境的追求：辅仁的创建		86
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	李天纲	97
1. “圣俗”与“中外”		97
2. 天主教世家和早年教养		103



3. 修士,神父,半途离会·····	109
4. 息影土山湾·····	116
5. 晚年的宗教思绪·····	123
6. 中国教会自主运动的先驱·····	132
“函夏考文苑”考略 ·····	张荣华 148
附录一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	157
一 函夏考文苑议·····	157
二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	162
三 致总统府秘书厅·····	163
四 致赵总理·····	164
五 致国务院·····	164
六 致张仲仁·····	165
七 致李孟鲁·····	165
八 致某某先生·····	166
九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167
十 考文苑名单·····	169
附:梁启超书·····	170
附录二 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	171
一 前言·····	171
二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173
三 “函夏考文苑议”·····	177
四 函夏考文苑发起人与初期人选·····	181
五 梁任公与马相伯、眉叔兄弟及函夏考文苑·····	183
六 计划中的函夏考文苑苑址·····	189
七 函夏考文苑的经费来源·····	191
八 函夏考文苑的尾声与流产·····	193
马相伯生平简表 ·····	廖梅 195
※ ※ ※ ※ ※	
国府褒奖令(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 ·····	20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马相伯先生祝百龄大庆的贺电	209
马相伯老先生百龄大庆祝辞	李登辉 210
相伯先生寿言	邵力子 211
祝马先生百年寿与民族复兴	应成一 214
敬贺马相伯期颐大寿长卷	217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	221
在复旦大学追悼马相伯先生大会上的报告	吴南轩 222
祭马相伯先生文	于右任 224
马相伯先生追悼大会启事	225
马相伯先生追悼会	226
甲、重庆方面	226
乙、上海方面	227
※ ※ ※ ※ ※	
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	张若谷 244
土山湾乐善堂旧闻	林 骏 257
马相老的新史合编直讲	石 漱 259
相伯夫子与复旦	复旦大学同学会 263
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	陈传德 267
马先生之言行	毛西璧 271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	邵力子 273
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	于右任 276
敬悼百岁老青年——马相伯先生	许涤新 281
我所见一百一龄马相伯先生之生平	黄炎培 284
马相伯先生事略	方 豪 289
怀念先祖父相伯公	马玉章 294
爱国老人马相伯在桂林	黎远明 303
马相伯先生印象片段	高平子 307

Fudan University 1905-2005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朱维铮

引 言

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却在政治史上十分有名。

这位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1840年4月7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恰在这一天,英国议会内辉格党人,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托利党人提出的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巴麦尊内阁派遣的远征军已在驶往南中国海途中。两年以后,用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习惯,即马相伯三岁那年,1842年7月,英国舰队便突入长江,攻占了马家居住的丹徒(今镇江)。道光皇帝被迫屈服,同意他的一名大臣与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停泊于南京城下的英国旗舰上签订了和约。它是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正式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被中国人引为奇耻大辱。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从这个意义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

马相伯也真长寿。当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1911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推倒,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他不但亲历了这七十年的中国的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而且参与了其中多次事变。“人生七十古来



马相伯摄于 1937 年



稀”，那以后，马相伯还活了二十八年，并且从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1939年11月4日，他在越南谅山去世，时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多月。照中国的习惯计算，他活了整整一百岁。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人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记录。

马相伯在三十七岁那年(1876)退出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场。虽然在二十一年以后，他又重返教会，却没有割断他同政界的联系。他去世前两年，还接受在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的任命，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因而，他涉足政治活动，虽然时断时续，或在朝或在野，但时间长达六十五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称元老。

不过这位政界元老，在晚清官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幕僚和外交官。帝国变成民国，他的政治地位升高了，做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做过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做过蒋介石政府的委员，但也没有获得过实际的政治权力。

中国有不少人至今没有改变把权力与成功混作一谈的习惯。假如把获得的实际权力当作政治家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马相伯只好被看作不成功的政治家。

可是普通的中国人衡量政治人物的价值，还有别的尺度，包括道德、学问、文章等方面的个人表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他以百岁高龄去世前后，那时人们一致称颂的，正是他的个人品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越到晚年越有政治声望的由来。

1. 局外旁观者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原因很简



单,如李天纲下文所介绍的,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居民生活得很自在。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相传1860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机,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一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的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却比较合乎历史。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就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



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也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属于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等)。既然在教会内部都难以忍受事实上的种族的或民族的歧视,那就更难怪马相伯对于本国的政治会用超越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前述他对清朝和太平军的比较,便超越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犯上即作乱”一类的观念,而把君民或官民是否平等作为尺度。在他看来,有利于平民就有利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马相伯在早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已经开始显露他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他反对种族歧视,在有白人优越感的某些传教士看来,就是有“排外”思想。但他又“排内”,也就是反对同国籍同肤色的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而同情受压迫受苦难的底层人民。这正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相伯的一生的起点。

2. 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马相伯在 1876 年放弃神职到 1897 年重返教会,中间共二十一年。

还俗的当年,马相伯便下了“宦海”,就是说登上了清帝国的内政外交的舞台。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关系”,同“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 1876 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 年 4 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